



花城年选系列
向继东 叶铁桥◎编选

2013 中国
民间记事 年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花城年选系列
向继东 叶铁桥◎编选

工2537
工2009
2013

2013 中国
民间记事

年选

廣東省出版集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2013中国民间记事年选 / 向继东, 叶铁桥编选. --
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4.1
(花城年选系列)
ISBN 978-7-5360-6979-4

I. ①2… II. ①向… ②叶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7182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丛书篆刻: 朱 涛
责任编辑: 欧阳衡 蔡 安 林 菁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装帧设计: ~~理想视觉传达~~

书 名 2013 中国民间记事年选
2013 ZHONG GUO MIN JIAN JI SHI NIAN XUAN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 16.25 1 插页
字 数 300,000 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n.com.cn>

序

向继东

这本书都是记者采写的。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记者？

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我党思想宣传战线卓越的领导人”（悼词语）陆定一在《人民的报纸——为〈新华日报〉八周年纪念作》一文中说，记者的责任是“把人民大众的意见，提出来作为舆论”。这与马克思关于报刊“生活在人民当中，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，同甘苦，齐爱憎。它把它在希望与忧虑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，公开地报道出来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卷 187 页）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。马克思说，“报刊按其使命来说，是社会的捍卫者，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，是无处不在的眼睛，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。”（同上，第 6 卷 274—275 页）在马克思看来，“报刊的主要职责，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”（同上，第 14 卷 755 页）……

做记者是需要职业操守的，没有职业操守是不能做记者的。大凡好的记者，都是时代的良知和眼睛。

有人说，中国记者不如西方记者。其实这是片面的，中国还是有好记者的，本书的作者大抵也可以算得上吧。无论是报道题材还是报道技巧，作者一般都有自己的视角和独到之处，尤其是记者与底层民众忧乐与共的情怀，堪称难得。

如何才能写出好报道？鄙人觉得：无论写人写事，竭力“跳出事件”写事件，“跳出人物”写人物，自然就“登高望远”了。编“民间记事”六年来，印象中，2009 年写事件类报道，《北京 60 大庆安保：“蚊子飞过，也要打下来”》就很不错。写人的，2008 年的《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》和《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》，前者是一篇人物特写，写得撼人心魄，为那种母爱感慨万端；后者就是一个案子，但记者采访细致深入，完全跳出了案件本身，把“杀人者杨佳”写得耐人寻味，让人读后思考良久……

今年本书收录了柴会群、曾鸣、杨继斌、刘长、雷磊、马国川等人的报道，应该说都是上乘之作，切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这里要特别提到“财新”法治记者罗洁琪，也许本年选还从未选录过她采写的报道，但我看过她财新网上的博客。为了能进法庭旁听她所关注的案子，可又没有获得“许可证”，她就混进去听，有时难免被“轰出去”。但她不气馁，“像做贼一样”，或贴在门缝边听，或趴在地上听……我是做过记者的，她的举动确实令我感动，自愧弗如。“冀中星爆炸案”发生后，她想到的是当年“冀中星被殴打致瘫痪”的时候，记者都跑哪里去了？作为记者，她内心里充满了歉疚。她博客里有一篇《矿工的故事》，短短几百字，道尽了记者情怀，这里不妨引录如下：

这个矿工叫李爱平。我记得他的名字。每当想起他的时候，我总会在心里问，他还活着吗？

2009年，我去武冈采访铅污染的报道。有个70多岁的老汉一直跟着我。他不会说普通话，我们几乎无法交流。

等我采访结束后，他把我引到一个村民的家里。屋子破败不堪、空荡无物。在一个角落，一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褥中。

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进博文《湖南初体验之三 矿工的故事》：

“这一次，我见到了在十年前受伤的一名矿工。我不知道那个空房子会躺着一个人。走进去，忽然看到一个长头发的男人在一堆被褥之下躺着……知道我是记者后，他叫我进去，对我说起他早就想了结的一生。他痛苦地挣扎起身，要给我看看他的脊椎和他已经没有知觉的双腿。

我来不及闭眼，看到了我恐惧的一幕。

后来，这个陌生的男人对着我痛哭流涕，并且在床上半躺着欠身鞠躬。我赶紧上前制止，我想，他弯腰的时候，该多疼啊！他背后，可是两截早已断了的钢板。

不知道是为了安慰他还是安慰我自己，我用相机拍了那个发黄发皱的判决书。我不知道，除此之外，自己还能做什么。”

那个男人因矿难而瘫痪，矿主拒绝赔偿。他赢了官司，法院却执行不了判决。他拿不到赔偿款。于是，他让妻子把他抬到法院和矿主的家里，用残废的肢体来哀求。他的维权无果。

为了生存，他牺牲了男人的尊严，让老婆嫁夫养夫。非常不幸，老婆嫁的第二个老公在几年后又死于矿难。

我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瘫痪十年了。可是，他还没绝望，还想着媒体能帮他。

我离开湖南后，他曾常常发短信。语气非常客气，显示了他曾受过的教育。

每次收到短信，我的心情都非常复杂。我曾想过，能否联系湖南的律师，免费帮他申请执行；也想过找熟人，联系湖南法院的领导，问问执行为什么不了了之。

但是，我又找到了让自己解脱的理由：都十年了，我能凭一己之力扭转这个局面吗？况且，我还要去求别人，说服别人同情他。

后来，李爱平的短信越来越少。我似乎如释重负。但是，今晚，我又想起他。四年又过去了，他糜烂的伤口好了吗？他还活着吗？

.....

罗洁琪的文字透着一种良心自责的力量。没有这良心，做好记者是很难的！她久久不能释怀于这个矿工的故事……正是好记者不可或缺的情愫。但愿明年能选到罗洁琪的文章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1月19日于羊城

Contents 目录

- 001 序 向继东

人 物

- 001 白岩松：有锋芒，不毕露 林楚方 黎嘉铭等
011 柳传志：我希望改革 反对暴力革命 马国川
017 要从世界看国家，不要从国家看世界
——专访周有光 包丽敏
022 “最大的风险是不做事的风险”
——专访“改革派官员”、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 李克诚
027 葛剑雄：遇见不平事要敢于讲真话 陈晓勤 余阳
034 张英洪：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 朱桂英
040 饶毅，不做院士又怎样？ 蒲琳

吏 治

- 045 一审刘志军 王晨
051 权力“惜败”学术惨胜——张曙光只差一票成院士 曾鸣 藏瑾
057 身边人眼中的王立军 雷磊 刘长东
062 附一：重庆“失足”警察自述“警示教育”往事 刘长雷磊
067 附二：“打黑基地”铁山坪里的回忆 刘洁 倪志刚
072 兰州交通局长的堕落轨迹 燎原
076 规划局长的权力生意经 傅天明

080	“失踪”的官员们	芦 壴 王 敏
088	一名小交警的匹夫之怒	庄 山

世 相

093	假装上面有人——调查“国内动态调查委员会”	曾 鸣 郭 琛
100	佛门反腐，刑上住持	刘 长
105	偷拍县委书记	徐丽宪
110	陕西富平贩婴事件	杨 璞
115	陕西书协换届再调查	康 正
120	“四老婆村官”背后还有事儿	姜浩峰

底 层

127	煤矿工人的“中国痛”	潘 毅 吴琼文倩等
132	南京饿死女童的最后一百天	柴会群 鞠 靖等
138	复制“贱民”——南京饿死女童母亲的人生轨迹	张 瑞
144	上访，非访，截访——河南截访案中的上访人自述	魏一平
152	禹州式截访	杨继斌 习宜豪等
158	临武瓜农之死调查 ——邓正加的11年和城管廖卫昌的12年	黄 芳
165	抢劫者杨某	葛江涛
170	职业药品试验者生存录	葛江涛 于晓伟
176	打工女孩袁丽亚之殇	刘子倩 杨 迪
183	资深访民的最后贿礼——襄汾县爆炸案调查	雷 磊等
188	爆炸者冀中星的暗黑人生	王九歌
195	“纵火者”陈水总	朱柳笛

教 育

199	超级高考工厂——衡水中学的“封神”之路	雷 磊 藏 瑾
207	寓言镇上的神话中学	陈 璇
216	为“状元”立像——一个贫困县的教育悲情	林 衍
220	“不作弊，不公平”：一个高考“强”县的养成 ——湖北钟祥集体围攻监考人员调查	雷 磊 张文字等
226	高考落榜生之死	陈 璇
234	高考状元与复读利益链	蔡如鹏
239	云南十万代课教师的最后一道“证明题”	雷 磊
245	高中生雇凶杀亲案：迷茫青春的毁灭	邱 杨

人 物

白岩松：有锋芒，不毕露

林楚方 黎嘉铭 马莉娜 谭然之 凌志敏

从我读大学时起，白岩松就坐在央视直播室的椅子上，到我工作十几年后，采访他的当天，他还坐在那把椅子上。他是 20 年前央视改革的“成果”之一，其他几个果子包括崔永元、水均益、方宏进……

只是，有人离开，有人淡出，有人早已不主流，但他一直主流，就没“支流”过。他出现在所有重大直播，包括足球比赛直播中，出现在接受央视采访的高官面前，他总是让“领导放心，观众满意”，对了，他还是十八大的代表。

而“此主流”曾经不被“彼主流”——所谓“体制外”主流所接受。

我的感觉是，外界对白的评价走了个“U”字形，最初几乎一边倒叫好——很简单，20 年前的央视什么样子啊，突然来一个滔滔不绝，还是崭新话语体系的 newface，谁能说个“不”字？
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出现了这样的评论：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带着伪善的面具；装作很正义的样子；总是板着面孔——岩松嘛，岩石上长的松树，能松吗？王朔说得更狠，篇幅所限不引用了。

还有说狠话的，说看到那张脸就换台……他的脸被称为“国字脸”，我没有搞明白这里的



“国”是“国嘴”的“国”，还是指他的脸的形状。当然，据说白岩松自己也调侃自己长得难看，但说句公道话，他长得不算太难看，属于还能看那种。

近年来，随着《新闻1+1》的推出，对白岩松的评价从“U”字形的底部逐渐升起来了，尤其是年初“两会”，作为政协委员的白岩松，在小组讨论时，当着很多领导直谏，阐述新闻记者的尊严是什么。

事后这段讲话流传出来，得到几乎一致称赞：“一点不中庸，说的都是实话。”我记得那天我向他求证，并告诉他这个讲话反响很不错，他承认是他讲的，事后他又说：“你们只看到赞扬，没想到我也受到压力啊。”

类似表现，加上之前的“主流”，有同行综合考虑，决定给他起个外号叫“正确先生”，无论在哪方面都那么正确。

我说：“岩松，你身上有几个标签，其中一个是‘正确先生’，喜欢吗？”没想到白岩松略有怒意：

“我们正在用我们讨厌的，爷爷和爸爸们用过的方法，讨论现在的问题，所谓‘正确先生’、‘不正确先生’。人性如此复杂，但现在一些‘80后’甚至‘90后’一上来就先给你盖个标签，我不喜欢。”

白岩松说：“有的标签是想当然的，‘体制内’还是‘体制外’，都是伪命题。你告诉我，你在体制外吗？我一直认为960万平方公里没有体制外，崔健说过一句话，只要毛主席像在那挂着，我们全是一代人，哪有什么代沟？”

对任何一个人的评价，我觉得都要慎重，因为，人，太复杂了，我习惯从看得到摸得着的地方看一个人，比如我们共同的朋友对他的评价对我就有参考价值：

“他是一个很正的人，他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主持人，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……几乎少有负面，连个绯闻都没有。”但是否“正确先生”，同一个人也说：“没错啊，这个评价挺准的，他就是挺正确的，各个方面，你都难挑出原则性的错，总能自圆其说。”

现在的我比20年前离现实更近

Q：你给我的感觉是以前很锋芒，后来做职业主持人，锋芒隐藏到你的提问里，这个转变感觉怎么样？

A：年轻时知道东西不多，仅仅是简单表达，别人会觉得你很冲，但“冲”的后面其实很空。人到中年看问题会更准，你知道“腰眼儿”在哪儿，会看到更多解决方案，会有更清晰的思路。这个过程就像人们说的，年轻时如果不叛逆是身体有病，中年了还叛逆是脑子有病。

我的第一本书曾说，如果骂人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，我会选择骂人专业——但解决不了啊。

Q：早期《东方时空》时的你，和现在的你，哪个离现实更近？

A：我现在节目中提的问题离时代的腰眼儿更近，跟早期《东方时空》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在没当年那么尖锐，但触碰更核心的问题，不会再想着“过瘾”。

Q：“过瘾”没意义？

A：毫无意义。

Q：想谈真问题？

A：当你更靠近最核心的问题时，会发现不一定要以锋芒应对。像去年“两会”，我心平气和地做了两期节目：一是要相信市场，不要相信市长；二是要进一步推动改革（去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），当时很多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在北京，如果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看了（我的节目），可能就会思考一下。但这些内容不含锋芒吧？是不是更核心的东西？

Q：“两会”上传出的那段你当着很多领导人讲话的记录，是不是锋芒？

A：领导在场时讲真话，这可能是大家认为的锋芒，但我在台里讲得更多。很奇怪的是，当时说好不对外传播，结果传出去了，在场的有六十来人，应该没记者，我估计是政协委员传出去的，现在录音多方便啊。

Q：现场反应怎样？

A：还可以，我也没说错什么吧？当然，不一定所有人都接受，大家也会有各种不同感受，这很正常，但他看了可能会思考，哪些是有道理的。最近赵启正也在说不要用“宣传”这个词了，他长期搞外宣，他建议不要用这个词，我们对外已经不用“宣传”这个词，开始用“传播”这个词。

Q：你的讲话传出去以后，很多人赞扬你，在意吗？

A：你知道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呢（笑）？（赞扬）对我不重要，我只说该说的。当然，我记得你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，我会觉得很欣慰，因为大家还是一样的，对吧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。关键是有机会就该表达，我不是从“锋芒”角度来理解的。比如，今年政协会上，我的提案中有个看上去不是什么锋芒的事。

我的建议是，国务院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，要定期在每月几号几号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或者一个月召开两次，那发言人本身就不会有压力，因为这是制度决定他必须出来跟记者见面。我为什么提这个案？今年是新闻发言人十周年，但十年下来这个制度进步还是退步了？

Q：停滞了？

A：对，第一批优秀的发言人带着热情、好奇、探索在做事，可现在都不见了。你看，武和平（公安部前新闻发言人）退了，王旭明（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）转了，王勇平（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）调波兰去了。但你说接替他们的人你还熟悉吗？

Q：这些部门还有发言人吗……

A：有啊。我的提案是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一旦制度化就难逆转。新闻发言人分两种：一种不想做，在诸如王勇平身上，看到很多风险；还有人想做，但感受到无形压力。一旦制度化就好了，你有这个机会就得干这个事，就能干这个事，没这个制度的话，你干人家会说你出风头。

Q：提案有回应吗？

A：没有。我想好了，如果今年没有很好回复，明年还会提（敲桌子）。



Q：一直达到目标？

A：还会提，这不是用“锋芒”来形容的。但我知道，这样做比骂一百句重要。一般来说，批判分两种：一种是呐喊，一种是批评，我现在更看重另一种，是你要做你的角色该做的事，做正确的、该做的事（敲桌子）。

Q：这才是“正确先生”啊（笑）……

A：那个词我不喜欢。我觉得我们正在用我们讨厌的爷爷和爸爸辈的东西，讨论现在的问题，人性如此复杂，但我们一些人一上来就先要给你盖个戳，所以我最讨厌站队。

我从不参加这样的辩论

Q：你是说，现在的你更喜欢做看起来不锋利，但实实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事？

A：真正的锋芒是推动力和解决方案，我们太容易给外在东西喝彩，打开微博、公共空间，全是很夸张的声音，但空对空的骂越来越没意义，而且大家不喜欢了，要不怎么有公知污名化？我把“公知污名化”当正向东西看，这是提醒每个在公共空间上发声的知识分子要思考，老百姓不再满足于说几句让他们过瘾的话了。

Q：或者说，这个东西在十几年前你已经玩过了？

A：所以我从不参加这样的辩论，你看我开过微博吗？都没有。因为我担心自己会去迎合，担心会去站队，担心自己会在某些虚幻的喝彩中……

Q：在你看来，真实的中国什么样？

A：我最近总在用“AB面”这个词。此时的中国，小到个体，大到中国，之所以难以判断，就是因为AB面都很鲜明。你可以看到地铁上有个女孩，暴怒暴骂，没公德，这是A面；一转身，也可以看到有人捡完首饰，原地站两个小时等失主，这都是中国。

我最近跟北京交管局新闻中心主任聊天，聊到马路上到处是加塞司机，可我跟他说，哎，你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没？排队的人比过去多多了，以前大家都挤到出口堵着，现在从很远的地方开始排队。当然，也有人加塞，但很刺眼了。

Q：批评本身是不是也在推动？

A：但只做批评，而且背后有各种利益因素时，你我都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回到“AB面”的中国，我一方面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公知，另一方面又看到很多优秀知识分子在研究真问题，比如我翻金雁的《倒转红轮》，翻《寻找苏慧廉》，我看《工厂女孩》，新疆的那个人大毕业生，从新疆跑到东莞，用亲身体验写工厂女工，等等。

我的意思是，你既能看到好多公知让你沮丧，一转身又能看到如此多的、安静的知识分子在沉下来做事，马上又收获另一面。此时的中国让很多人心绪难平，就是AB面的共存。所以，我，站中间吧。

胡锡进挺好玩的，没那么复杂

Q：怎么看“左”和“右”之争？

A：如果是真“左”真“右”，我都喜欢，但我们生活中，一些知识分子是真“左”还是真“右”？当然，我不排除有真的“左”和真的“右”。但大多时候，我会把这两个字加引号。

Q：我知道你和《环球时报》总编辑胡锡进有交往，你怎么看他们的基本观点？

A：交流过，我觉得多一种样态不是很好吗？虽然我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，有时候我当面都会说他，但换个角度看，谁说只允许你赞同的声音出现？而且现在不正是需要慢慢让人们接受不同的声音，然后还能包容吗？你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不能不允许你不同意的观点存在。

Q：但批评他的人会觉得，是不是有其他东西在后面？

A：我觉得没那么复杂，老胡不过是在传媒里找到自己生存空间罢了，他一切的出发点是替自己服务的报纸来考虑，《环球时报》在大家众说纷纭甚至批评之中，走出了自己的路，从报纸运营角度是成功，不是失败。

Q：从商业角度来讲是成功的？

A：对，而且中国传媒需要这样一个概念，“环球”这样一张面孔是过去中国传媒里没有的，像民族主义，激进得有某些愤青的气质，但填补空白永远比留着空白强，所以，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内容，但你要认可多元化，而且多元化之后，你一定是受益者。

Q：你跟胡锡进交流过，你感觉他跟他领导的报纸相似吗？

A：挺像的。这哥们非常勤奋，报社写评论的人得永远陪着他。我很担心很多人，在用我们讨厌的方式去反对。他是挺好玩的一个人，没那么复杂。

Q：你到底怎么看他的观点部分？

A：有很多观点我不同意，对我们这些有清晰价值体系的人来说，会被一两句不赞同的话改变了？气着了？不至于！保留多元性就好了，现在中国传媒不是多元太多，而是不够的问题（敲桌子），要不断拓宽边界嘛。理性怎么建起来？不是对你赞同的声音表示支持，而是对你不赞同的声音表现包容。

很多“爱国主义者”移民了

Q：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错觉，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的，而很多人看到的世界，也是真实的？

A：所以我用“AB面”这个词，如果只看到喧嚣的A面，慢慢就会产生错误判断，沮丧、失望然后觉得危机四伏，但看到B面的时候……

Q：又会信心满满？

A：我从来不用这种词，我刚才强调要走在中间，既看到危机四伏，又要看到



稳定而积极的力量，从个人角度来说，我是悲观主义者，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说，尤其是中国，我是极其谨慎的乐观主义者，而且，你不乐观怎么办？

Q：唯心啦（笑）。

A：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不乐观怎么办？当你把对方想象成朋友时，他最后就真成朋友；当你把对方想象成敌人，他最终就会成为你的敌人，时代也是如此。

Q：我有类似的观点，就是这个世界你用简单的方法和它相处，世界可能就简单了；你用复杂方法和它相处，世界可能就真复杂了。

A：如果你认为中国一点前途都没有，你做的所有事、你的思维都会围绕这个来安排，然后中国可能就真没前途了。

Q：都移民去了（笑）？

A：对，我没有任何亲戚在国外（笑），从来没想过移民，但我知道，有很多爱国主义者已经移民了，或者说是嘴上的爱国主义者，对吗？

Q：我以前有个感受，我们越年轻越想改变世界，甚至整个世界，年龄越大想改变的世界越小。

A：不是。你起码听过一首歌吧——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”。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选择题，你在改变世界，世界也在改变你，但到一定岁数，就会明白，年轻时总天真地认为，有终极目标实现的那一天，现在我明白，人类永远没有终极目标实现的这一天，所以，心平气和。

Q：例如？

A：我一直觉得，当下中国是心和脑都有问题，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是治心和脑子，但你认为治完心和脑子中国就彻底健康了？不对！心和脑子治好了，下一代人他得治肺，再下一代人是胃，永远有问题，永无穷尽那一天。翻看100年前的报纸，你会发现当时的头版头条，跟现在关注的问题没差太多，只是包装变了，内核同样。

啄木鸟不会天天搞歌颂

Q：你把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还是职业主持人？

A：我通过主持人这个职业，承担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，逃不掉的。

Q：你承认你是知识分子？

A：我说我不是知识分子就不是吗？我在节目中说，一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以爱为底色，像啄木鸟一样啄出树上的虫子，既让自己有食物，又维护林子健康。决策者也应明白，知识分子的忧虑或批判，是他的天职，不表示不理性。我们说唐朝很棒，但如果有机会穿越到当时的茶馆，知识分子们一定在忧心忡忡地谈论乱象，这是他们的天职。

Q：新闻记者是啄木鸟？

A：新闻永远跟某种力量在对抗，永远！要到处吃人家的虫子，还要破坏人家的利益。从职业角度看，全世界没哪个国家新闻从业者的收入水平排中上的，全中下，所以，一个年轻人选择干新闻时，如果仅为养家糊口，不建议你进这个行业，去

中石油中石化吧。但你想要新闻给你另一种收成，那你来，准备过不那么心平气和的日子吧。

Q：啄木鸟，不会干革命的事情？

A：中国很怕革命家的。每次去大学演讲，我就鼓励大学生一定要成为中国这列火车后面的推动者，因为这列火车特怪异，前面有人拦着，还有人在侧面推，更可气的是相当多的人，坐在车顶从不推，还指手画脚，这就是现状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火车后面推，这列车就会非常坚强地在各方博弈中……

Q：往前走？

A：对，12年前我写第一本书《痛并快乐着》，那时候30岁，但我觉得有话一直没错，就是序里最后几句话中的一句：我认为在中国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。方向是对的，哪怕你停着也比开错方向好。但现在维持一个正确的方向越来越难。

我很清楚欲速则不达

Q：那现在的状况，你觉得是停滞，偏航，还是？

A：速度慢下来，但方向还没出现大的背离。

Q：在修车？

A：嗯，在酝酿下一次的启动，但是不是沿着我们期待的方向，我谨慎乐观，因为接下来的几场（改革），经济体制到最核心地步，政治体制怎么做，作为知识分子，我很清楚欲速则不达。

所以我一直在呼吁第三种改革，就是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的改革，就是心灵改革，没有心灵改革，前两者实现不了。在台湾转型过程中，大家只注意到解严，却忽略了台湾在九十年代开展的心灵改革。

如果没有那场改革，就不可能有慈济（台湾最大的慈善组织），都是改革的结果，台湾的心灵革命，成功地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安全网，如果没有这个网，很难想象经历族群之争、蓝绿之争的转型还会稳定。关键它的心灵革命还是去宗教化的。

Q：包括教育改革吗？

A：都包括啊。我曾当面跟温家宝总理说过：“总理，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，是我们没有从更高层面上理解教育的目的，我认为，教育的使命是承担培养未来什么样的中国人。”

Q：原话？

A：原话。我跟总理说，教育必须有更宏观的思考，教育不是简单的人才培养，而是培养未来什么样的中国人。一旦理解教育是为这个目的服务，很多理念，包括课本都应发生相应调整，最后我跟总理说，我们这么多年都在培养人才人才人才，但只放在“才”上，忘了“人”。

Q：那他怎么说？

A：我觉得他的回应是正向的，因为他也在关注教育，他熟悉教育。

Q：我知道好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教育。



A：对啊，但谁谈过这个问题？教育宗旨的第一行就应写上，“中国教育承担的最大职责是培养未来的中国人”，一旦有了这个，就明白要发生很多调整，除了知识传播之外，团队（协作能力）、心理承受力、规则意识等等，都应该纳入教育，现在还有很大差距。我们现在纠缠战术，但战略不清晰。

Q：“第一行”确立下来，慢点也没关系是吧？

A：没错。但现在很多东西的第一条没确立下来，全在玩战术，可中国缺战术家吗？每个座位上坐的都是战术家啊。所以大家都在抱怨，中国一大特色就是抱怨。

不看《新闻联播》，还可以看《新闻1+1》啊

Q：你的观点听起来都不错，但大家都说不怎么看电视，包括《新闻1+1》，你担心吗？

A：从不担心，我一直给自己定位是内容供应商。前年我们节目改版时，我写的第一句话就是：《新闻1+1》是个在电视上首播的多媒体栏目，我已经不说它是电视栏目了。

作为内容供应商，何必关心渠道变迁呢？我从不用新媒体、老媒体概念，为什么？我常说，我见到很多老媒体日渐新了，我也见到很多新媒体一出生就老了。到处都是这种现象。

Q：有没有人建议你离开央视？

A：很多人说，问题是，如果你想在中国做新闻，你能找到比央视离新闻更近的地方吗？没有。如果其他东西对我有吸引力，比如钱，那我可以不在这儿做。但到现在为止，我最迷恋的还是新闻现场，不排除三年、五年、十年后会转变，所以，我不敢打包票我会一直在央视（笑）。

Q：其实央视也有你说的AB面，像以前的新闻评论部，可能是B面。

A：对，但现在骂央视快成时尚了。

Q：也有人辩护说，还有崔永元、白岩松这样的人在央视啊？

A：既不用骂也不用辩护，我有时候开玩笑说，你不看《新闻联播》，还可以看《新闻1+1》啊，你不喜欢这个人，可以看那个主持人呀。在中国，你给我找到一家有央视这么多怪异的主持人的电视台？

Q：在柴静的新书发布会上，你还说：“还有毕福剑，老毕，天啊，那也是主持人……”

A：毕福剑是我同学，我可以挤对他。阿丘、崔永元、张悦、柴静、泉灵、小萌，各种千奇百怪的人同在，挺好的。

Q：你们经常会提及一个人，就是陈虻（曾任央视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），他似乎是你们的共同记忆？

A：因为陈虻走了，大家都在谈他，其实那时不仅一个陈虻，是一批人：王胜（中央电视台副台长，曾任新闻评论部主任）、时间（曾任《东方时空》工作室总制片人）、坚平（《新闻调查》原制片人）、陈虻、张海潮（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副总

裁，曾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），一大批。

Q：如果没孙玉胜的话，可能也不会有陈虻这批人？

A：当然，还有李东生（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，现任公安部副部长）等等。所以我一直说是运气好，因缘际会，我跟小崔这班人赶上了。我们全家都是搞历史的，回头看历史，你得承认，好多事情因缘巧合，错过就赶不上，到早了就成烈士。

Q：我听过亲历者说起，那时很强调人文情怀，不仅仅对外，还包括对内人文。

A：对啊！人文是表演不出来的，只有骨子里头有这样的东西，才能传递出去这样的东西。不对内人文，无法对外人文。

说崔永元：没什么不愿意提的

Q：那一批男主持里，你和小崔是“两大”，但你好像不愿意提他？

A：没有啊，没什么不愿意提的。

Q：没有？一直以来，外界会把小崔和你，当央视两个大哥大看。

A：那很好，第一，我们两个都是广院新闻系毕业的，起码证明了广院新闻系还可以出主持人吧（笑）；第二，我们俩都是电台出来的，最初我到《东方时空》还是他引荐我的。

Q：有没有瑜亮情结？

A：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，一开始就不一样，他在做谈话，我在做新闻，而现在我在做新闻，他在做专题，我觉得我们一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吧。

Q：底线没区别，方式不一样？

A：对，应该是非常相似。我说句大话，我经常很庆幸，就是我们几个运气好，好就好在有一批水平接近的队友兼对手同时存在，问问老评论部就清楚了。

Q：你也承认，你们这批人，是既得利益者？

A：对啊！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，《新周刊》拿我这句话做了期封面，“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”。我很清楚，我是持续20年新闻改革的既得利益者，但我必须要思考，做一个什么样的既得利益者？对我个人来说，当你成为利益既得者时，你把利益给自己，还是更多分享？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事，我还号召很多人做这样的事。

Q：那你选择做怎样的既得利益者？

A：我悄悄在做一个好的既得利益者，从去年开始我就做东西联大项目，每年带10个研究生，广院的、北大的、清华的，一带两年，一个月一天课，我觉得起码能带到70岁，（至少）65吧，65的话也200多人了。

Q：做这个事情来自内心力量，还是外界要求？

A：如果只是自己获得（利益）的话，我可以走上市场，让我的价值被人民币展现一下，估计不会便宜吧？只要我离开央视……但我不认为有了钱就幸福，当然，如果没钱也想幸福是说空话，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说自己如何清廉，然后不在乎物质。但我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子过得好得多了吧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只是跟同行比起来，差一些。